

临汾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
临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

目 录

· 风 云 纪 实 ·

严惩罪犯——忆临汾解放初期的一次判决大会

.....张敬斋口述 梁正岗整理 (1)

山西政治保卫队在临汾.....戈 力 (4)

临汾敌工站和陈自然烈士.....李玉荣 (15)

无比的力量——追忆临汾人民热烈迎送西征大军

.....仪庚德 (23)

· 工 商 史 话 ·

漫话“京客”——临汾人在京经商初探.....王保兴 (32)

黎明前的临汾铁工厂.....林解 林动 (53)

名厨师曹仁虎.....吕九成 (72)

吴家熏肉的来历.....梁正岗 (84)

· 名 门 望 族 ·

下靳王家.....梁正岗 (97)

盼盼子三代兴衰记.....陈文秀 高国宪 (103)

· 古今人物 ·

缅怀爷爷张桐斋.....张红霞 (113)

廉洁贤能的尹翁归.....石青柏 (118)

· 历史见证 ·

修复鼓楼工程中一起勒索案始末.....王仲玉 (121)

一笔不应忘记的“血债”.....刘怀记 (124)

旧社会官派徭役一例.....樊思贤口述 吕九成整理 (126)

阎锡山在东涧北村旧址现貌.....孙戈 高顺 (140)

· 平阳史考 ·

古都平阳.....石青柏 (128)

嘉泉村名的来历新说.....孙戈 (137)

动态一则..... (139)

严惩罪犯

——忆临汾解放初期的一次判决大会

张敬斋口述 梁正岗整理

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临汾刚解放，在秩序还不够稳定，敌特还未肃清的形势下，就从洪炉台的军民大会上传来一条爆炸性新闻，我军枪毙了一名为解放临汾立了功的战士。一时城内议论纷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傍晚，临汾后勤司令部的干部战士，奉命在老母村的打麦场上参加进城前的动员大会，天还不十分黑，周围却宁静得怕人，一种大战前的气氛，扣紧了所有到会人的心弦，干部、战士都恨不得一下飞到前线阵地。

太岳行署主任裴丽生同志慷慨激昂地作了动员报告，他说：“临汾城就要解放了，我们后勤司令部已改编为城市工作委员会，担负接管任务”并反复强调说：“临汾城内，集中着不少敌人的头目，他们多年来搜刮了大量民财，现在要逃跑，会遗留下很多值钱的东西，进城后如果我们弯下腰去拾，就有被金银财宝迷住眼睛的可能，所以大家进城后，要坚决执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做到‘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不管谁违犯了城市纪律，都要严肃处理……”在此之前，我们参加会议的干部战士，早已熟悉了临汾城内的地形和各敌机关的位置，会议结束后，我们各接管小组，分头研究完成任务的方案，做好进城的准备。晚上十时出发，夜里黑乎乎的，我们城市工作委员会尾随正规部队于五月十七日黎明进入城内，很快进入岗位，开始工作。

入城刚几天，我们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全部干部战士就接到命令，到洪炉台参加大会。全场的气氛非常森严，部队在北侧，市民群众在南侧，中间被一条大绳隔开。同志们都低声议论：“发生了什么事？”洪炉台上坐有徐向前司令员，裴丽生主任等首长，突然台上一声令下：“工兵执行任务！”十余名工兵出列后立刻跑步至会场东北角的空地上，挖了土坑。参加大会的干部战士和市民群众看到枪毙人的阵势大为吃惊。土坑挖好后，裴丽生主任宣布：“把罪犯押上来！”全副武装的执法队战士，将两名罪犯押至会场前，罪犯耷拉着脑袋，面色苍白。

裴丽生主任讲：“同志们，这两名罪犯是在临汾外围战斗中参加我军的，在解放东关时，他们担任主攻手，由于熟悉地形，作战勇敢，特别是在攻克一号碉堡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但是进城后，昨天晚上他俩以借剪刀为名，闯入阎军一个营长的姨太太家，插上门栓，企图奸污，被我军执法队当场抓获。同志们，这件事情发生，使我们感到非常痛心，这两个战士没有经得起考验，损害了我们解放军的形象，尽管他们俩人很有战功，但不能以功抵过，按照城市纪律有关规定，必须对他们给予严惩。敌人在我们进城之前向市民们宣传：“解放军实行‘二十四刑’、‘三十六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这纯属造谣！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打临汾是为了解放灾难深重的临汾人民，进了城，更要保护人民，帮助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部队有着铁的纪律，决不允许危害人民的事再发生，也不允许危害人民的坏人存在于我们的队伍之中，就象眼睛不能容忍一粒沙子。进城前，就在五月十六日，我们就召开会议，强调了严格的城市纪律，今天惩办罪犯，进一步表明我们纪律的严肃性。”裴丽生主任讲完，徐向前司令员突出强调了我军进城后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并再次申明枪毙罪犯，维护法纪尊严的意义。这时，台下市民中有人低声哭泣，

接着裴丽生主任铿锵有力地宣布：“将罪犯拉下去执行枪决！”话音刚落，只见从群众冲出一个白胡子老头，“扑通”一声跪在台上，大声喊叫：“全城的父老乡亲们，你们都跪下！”会场南侧市民们黑压压地跪下一片。又侧身面对台上说：“八路军老总们，我叫邵福昌，我受父老乡亲的委托，求你们开个恩吧，太原还没有解放，给他俩立功赎罪的机会吧。”“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参加大会的几千市民恳求着。这时徐、裴首长交换意见，裴丽生主任宣布：“严惩罪犯，是我们铁的纪律。由于临汾刚解放，群众对我们的纪律还不很了解，考虑群众的要求，决定将首犯执行枪决，胁从犯陪绑，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这时邵福昌和市民们才站起来。会议结束前，执法队将两名罪犯押至工兵在会场东北角挖好的坑前，只听“叭叭”两声枪响，一名罪犯倒入坑内。广大干部战士和市民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回忆山西政治保卫队在临汾

戈 力

山西政治保卫队在抗日的烽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山西政治保卫队这里指政治保卫队本队，另外，还有政治保卫队1—4支队。新军整编时的本队编为二〇九旅，第一支队编为二一二旅，第二、第三和第四支队编为二一三旅，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新军。本文记述的是山西政治保卫队本队（二〇九旅）在临汾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亡我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八月一日，北平、天津沦陷。日寇沿津浦、平汉铁路线南侵；其主力沿平绥、同蒲铁路线以大迂回态势前进，企图一举攻占山西太原，直接危及了阎锡山土皇帝的统治。面对日寇侵略华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进山西，沿同蒲铁路北上晋北抗日前线。山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和各县牺盟会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和游击队。阎锡山为内外形势所迫，也为保持自身的统治，同意了共产党人薄一波提出组建新军的意见。八月一日，在太原由军政训练班和民众干部训练团，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团），政治委员薄一波，政治主任牛佩琮。又相继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第三、第四总队（团）。九月间在祁县以祁县军士二团的第二、第三营和太谷县军士一团的一个营，加忻县教九团一部二百余人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总队（团），团长崔郁（旧军官），政治委员张文昂，政治主任韩钧。成立决死二总队时，采用自上而下的大、小会动员，号召

爱国抗日青年报名参加抗敌决死队，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营区立即掀起报名高潮，有的战士咬破手指，写下了“抗日救国血洒战场”的铿锵誓言。

韩钧同志在组建决死总队时，考虑到这支部队新建，虽然有党的领导，各级政治干部大都是共产党员；士兵为青年学生，抗日情绪高，思想进步，政治可靠。但是党在基层的力量还很薄弱，尤其是团、营、连、排长都是阎锡山的旧军官，其中有些人还很顽固。为了使党手中有一支政治上可靠的武装，韩钧决定在三个营各成立一个政治保卫队（排），战士、干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的青年。内有个别共产党员，如三营政治保卫队队长贾耀祥，晋绥军官教导团第一期学生，一九三五年入党；政治工作员戈力，山东寿张省立第八乡师学生，太原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十二连学员，一九三四年六月入党；二营政治保卫队队长武世鸿，一九三七年入党。各营的政治保卫队归一、二、三营的政治主任廖井丹、刘俊才、苏宇涵（都是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和指挥。之所以定名政治保卫队，是韩钧同志借鉴和运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卫队的经验。

十月初，决死二总队由祁县出发，沿同蒲铁路南下霍县、赵城、洪洞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南下途中，各营的政治保卫队刷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宣传品，宣传发动群众，作抗日讲演，教唱抗日歌曲，动员参加决死队，抗日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二营政治保卫队在霍县火车站做宣传工作时，日本飞机飞到霍县，一个汉奸打出日本的“太阳旗”给敌机指示轰炸目标。当即被我政卫队抓起来，会同霍县牺盟会和驻军决死队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枪毙这个汉奸，由政卫队执行枪决。三营政治保卫队随二总队部驻赵城。十月，韩钧在临汾二战区司令部开会时，说到决死二总队建立了政治保卫队的情况，阎锡

山、梁化之听了之后很感兴趣，提出将政治保卫队调给二战区政治部。韩钧返回总队部后，报请中共山西省委军事部部长黄骅（八路军晋西支队政治委员）批准同意，将三个营的政治保卫队集中于赵城，在县城一个四合院，韩钧宣布合编成立政治保卫队（连），任命贾耀祥为队长，戈力为政治指导员。韩钧同志讲话时说：“为了培养训练干部，增强抗日力量，扩大抗日队伍。全队一百二十余人，分编三个分队（排）、九个小队（班），一分队队长李福星，二分队队长武世鸿，三分队队长唐贵龄”。行前，全队干部、战士都发给一支德国式自来得手枪，一百二十发子弹。队员佩带黄缎条写的（山西政治保卫队）胸章，非常醒目。

我政治保卫队（连）于十一月初到达临汾，向二战区政治部梁化之报到后，指定驻鼓楼西省立第六中学。当时临汾驻有二战区长官部、民族革命大学，随营学校，山西牺盟会总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一一五师刘村学兵队……。临汾一时成为山西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托派头子张慕陶也窜到临汾活动。我们这支小分队出现在临汾街头，引起人们的注目。我们同民先总队部（我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北平参加民先）和临汾县牺盟会联系后，在临汾搞抗日宣传活动、演街头剧，为伤病员募捐，参加了斗争张慕陶的活动。这期间，日本飞机到临汾狂轰乱炸。阎锡山为了防空袭，二战区长官部、随营学校移住临汾城西北之土门镇的东、西涧北村。阎锡山住东涧北村西头路北山崖下窑洞里，我政治保卫队随驻东涧北村东头村外路北一个四合院。该院有前后两个院，前院只有一个南大门、耳房和东小便门，后院北面山崖下有五孔窑洞，院内东西两侧都是三间平房。我政卫队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这可是不寻常的三个月。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我队同阎锡山住地近在咫尺，我们几个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我们不仅掌握住这支小部队，而且扩充政卫队为一个大队（一九八六年五月重游东涧



图为山西保卫队本队，在临汾市东涧北村东头住扎时旧址现貌。①为大门前的巷道②、③为居住的前院和后院

高顺摄影

北村时，信口哼了一首小曲：“风华青少年，同虎巧周旋，讨得一支令，队伍大发展”）。

阎锡山、梁化之对我们这支青年队伍怀有阴险用心，对我队实行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给每个干部、战士发了皮大衣、皮帽、风镜、指南针。阎锡山、梁化之到政卫队驻地看我们，全体官兵在院中列队欢迎。队长贾耀祥向阎锡山报告后，我们唱了几首抗日歌曲，呼口号，其中有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阎锡山问战士们的年龄？都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年龄，战士各自举手回答。我们听到传言，阎锡山意欲把我政卫队编为他的卫队。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一面同积极分子在战士中作工作，一面寻找对策。趁阎锡山接见时，几个战士向阎锡山递条子说：“我参加政治保卫队是为了抗日，我们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不当卫队。”阎锡山看了看条子，未置可否。接见后，阎锡山的副官发给每个队员五元山西钞票。阎锡山到随营学校朝会讲话，照例通知我队参加，并站在前排，我们唱抗日歌曲，当拉拉队，活跃会场。阎锡山在讲话中大肆贬低八路军平型关歼灭日本板垣师团的伟大意义。我政卫队的战士是一九三七年四、五月入伍的，政治觉悟的识别能力较高，看清了阎锡山大军阀的本质。我党亦很重视和加强领导我政卫队同阎锡山的斗争。在我队进驻临汾省立六中后不久，中共山西省委军事部王逢源副部长来到临汾，同贾耀祥接头，指定贾耀祥为政卫队党支部书记，受王逢源领导。党处于秘密活动，贾耀祥同戈力、武世鸿单线联系。这是我政治保卫队的第一个党组织。我政卫队移住东涧北村后，教导七团刘俊彩（共产党员）调来我队任政治工作员，我党支部有四个党员。我们几个党员向战士们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主张和胜利消息，培养骨干分子，警惕阎锡山、梁化之欺骗拉笼的阴谋。特别是警惕梁化之的特务窜来政卫队活动，同他们作合法的斗争。梁化之抓捕我平陆县牺盟会特派员，送到我政卫队看管，我告诉看守的战

士说。这个同志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活上要多加照顾，要他到土门镇收集抗日宣传品、小报，送给这位特派员。

新军和牺盟会领导同志非常关心我政卫队的成长。牛荫冠、刘岱峰、吕调元同志都常来政卫队指导和帮助工作，给我们讲课，找干部、战士个别谈话，我在政卫队建立一个战士学习园地“列宁室”，刘岱峰看了后说，阎锡山看到一定不高兴，改为“民族革命室”。十二月的一天，薄一波同志到政卫队接见我们，他听了队员唱的“沁花江上”等歌曲，亲切地对我们说：“现在战局很紧张，你们要学政治、学军事、要准备打游击，要扩大队伍。”遵照一波同志的指示，我和贾耀祥向梁化之提出，要求扩大队伍，也给阎锡山当面说过，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我政卫队在临汾省立六中时，一个洪洞战士手枪走了火，打穿了自己的腿，送到医院。我队移往东涧北村后，我准备去临汾医院看望这个战士，向梁化之请假，要他帮助坐顺路车。第二天下午，梁化之通知我去坐车，上车后才知是阎锡山的专车，他坐在后座，旁边有一个随从，我坐在司机旁。路上，阎锡山问我政卫队情况时，我顺便提出政卫队扩大队伍的事，他点头同意。梁化之同意用随营学校招生的名义动员扩军。全队战士回本县家乡，在同蒲路沿线和两侧各县扩军，规定春节前后归队。我带两个战士到洪洞、赵城、霍县检查帮助工作，在霍县出了一个小事故，晚上睡觉时在室内烧木炭取暖，我睡中醒来头晕发呕，知是煤气中毒，急忙从炕上爬下来爬到门口，打开大门，我们三人才有幸活下来。一九三八年农历年前后是大批青少年投奔临汾东涧村北报名参军的高潮。郭丰瑞招收新队员邢国钊、张承恩、廉鉴德等十多人，有的一个带二十余人、三十余人成批参军。通过口试录取，口试题目诸如：“西安事变是何人发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哪些内容？你为什么参加政卫队？……”。口试只是个手续，回答不圆满的也留下了。当时是抗日高潮，红军东征时在这一点播下抗日火

种，加之各县牺盟会的宣传动员、协助工作，我们扩军是很顺利的。这次参军的沁源县村自卫队指导员刘靖国说：“决死队、牺盟会在群众中留下良好印象，同旧军队不一样，我参加政卫队父母放心。”农历正月十八日，成立政治保卫队大队，按年龄大小分别编为一、二、三中队，十四、五岁编为儿童团（约一百余人），成立一个三十多人的小宣传队，全大队近七百人。大队长贾耀祥，一中队是比较精干的一个中队，我到一中队任指导员，中队长徐锦（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叛变投奔阎锡山）。二中队长王天枢、指导员黄伊基、三中队长梁松龄，均为共产党员。我们这次在同蒲沿线扩军的影响很大，我政卫大队离开临汾以后，有些青少年还寻找到东涧北村，前来参加政卫队。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由太原沿同蒲线南侵临汾，阎锡山逃到吉县西过黄河，我政卫大队同随营学校、牺盟总会向吕梁山区转移，二月下旬从临汾土门出发西行，经襄陵、蒲县进至吉县。我政卫大队是边行军，边配备干部。适值随营学校第二期学员毕业，我大队干部大部从随营学校调来，全大队干部基本配齐。牛荫冠从随营学校先后调给我大队干部十六人，内有共产党员十余人，加强了党组织的力量。我小政卫队时的战士大部提升任班长、排长、政治工作员等。而战士都是初小、高小、初中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高小学生，这个大队的政治、文化素质是好的，这就是阎锡山、梁化之对这支部队垂涎三尺的原因所在。

在吉县的后西沟，梁化之决定随营学校停办，同政治保卫大队合并，成立“山西政治保卫队总队”，梁化之自任司令。我政卫大队一分为三，分编为二大队（辖四、五、六中队），儿童大队、金刚剧团，皆属总队建制。二中队队长贾耀祥，乔若明（乔明甫）调来任大队指导员。同时成立一大队和三大队，一大队队长白彭年（白云），政治指导员杨国兴、三大队政治指导员景人杰（景涛）均为共产党员。三大队队长秦瑞芝，一、三大队是只有

官而无兵的空架子。牺盟会总部郭钦安随二大队行军，驻队工作约两个月，帮助建立民族革命青年团，给我们讲课，行军中以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部队，并带动我们检查我队在驻地群众纪律。

梁化之同长官政治部以及牛荫冠、刘岱峰、张韶方、孙定国等一批军政干部，同山西政治保卫队由吉县东进，三月上旬进驻汾西县西南之山云镇。梁化之又决定成立四、五大队，也是有官无兵的空架子。六月，将决死四纵队临汾学生游击队编入山西政治保卫队为六大队，大队长孙为，政治指导员张靖华，均为共产党员。临汾学生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成立，由李力果同志负责组进，派老红军共产党员陈焕如（李明如）任教导员建设部队。该队党员及军事政治素质较好。临汾失守后，学生游击队在临汾以西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数次袭击和伏击日军，有同日寇作战的经验。六大队儿童队四十余人编入儿童大队，此时儿童大队已增至三百余人，依年龄大小，分编为龙、虎、狮三个中队。梁化之在山云镇住了两三个月回吉县阎锡山那里，刘岱峰代司令，一月后也去吉县，由张韶方代司令。阎锡山、梁化之以随营学校作骨干，组建扩大政治保卫队，意图建立一支他们控制的军队，梁化之声言要建立一支“政治化主义化的军队”。但是形势和情况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广大知识青年要求抗日，追求进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随营学校绝大多数学员要求抗日和进步，转入随营学校的晋绥军官教导团二期学生和少数一期学生中有共产党员，但绝大多数是要求抗日追求进步的青年。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是少数。一、二期晋绥军官教导团的学生转入随营学校后精神面貌大变，高唱抗日进步歌曲，读进步书刊，有的人慎重地秘密寻找共产党。这批军事干部成为山西政治保卫队的建军军事骨干。我党在组建政治保卫队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以极大的决心将一批共产党员调到政卫队任各级军政干部，使我党从

建队开始就掌握了这支部队，其中，第二、第六大队的党组织力量较强。二大队有党员十六人，成立大队党支部，支部书记乔若明，支部委员贾耀祥、戈力、刘俊彩。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战士中发展党员，至一九三九年“晋西事变”前，全大队党员增至五十多人，大队成立党分总支，书记贾耀祥，委员梁松龄（梁平）、戈力、刘俊彩。大队下属三个中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四中队党支部书记戈力，五中队党支部书记刘俊彩，六中队党支部书记杨严志（一九三九年冬去秋林受训未归，叛变革命）。晋西南区党委军事部王逢源、张一清同我二大队党组织联系，传送党的文件，传达党中央、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领导我们同顽固分子作斗争。

一九三八年六月，成立山西政治保卫队政治部。乔若明调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并负责政卫队的党的工作，经晋西南区党委批准，建立中国共党政卫队委员会。政卫队顽固分子由于朱志贵调任二大队政治指导员，我们同顽固分子的斗争复杂化了。朱志贵公开贩卖阎锡山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等黑货，可是没有多大市场，战士们热爱革命真理，反对谬论，他讲课时战士们不愿听，有的请假，有的上“厕所”，有的课堂上打瞌睡，课堂上冷冷清清。朱志贵像游鱼一样到处乱窜，见到战士读列宁的书，他翻了翻书阴险地笑着说：“看那个干啥？能看懂？”“你知道十月革命是个啥？”一九三九年夏，朱志贵调政卫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顽固分子田天德调任二大队政治指导员。二大队是顽固分子同我们争夺的重点，用他们的话说：二大队是“未来发展的骨干。”朱志贵、田天德、王近凯（六中队指导员）、齐云卿（四中队工作员）等少数顽固分子自恃高明，有后台老板阎锡山，实则是顽固不化、笨拙和阴险，不得人心，在二大队处境很孤立。我用调虎离山的办法，齐云卿、田鸿美（顽固分子排长）李树堃（顽固分子工作员）调出连队，提拔党员任排长，政治工

作员。我们党利用阎锡山可以接受的口号，在新军和山西政治保卫队建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团，是我党领导的外围青年组织，上级决定党员不暴露共产党员面貌加入“民青”，掌握民青领导权，乔明甫负责领导政卫队的民青工作。基层中队成立民青支部，我任四中队民青支部书记。党员或我培养的骨干任支部委员。我党组织通过民青团结教育广大战士，培养发展党员；党支部各种活动以民青来掩护。党支部还掌握了基层连队民族革命室这个阵地。民族革命室是战士的学习园地，发挥民主的讲坛，批判顽固分子谬论的讲台，文体活动的场所，党支部通过民族革命室团结教育广大战士，引导战士同顽固分子作斗争。我党组织掌握和领导民族革命青年团、民族革命室，对团结教育青年、巩固部队，巩固党的领导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山西政治保卫队进驻汾西山云镇以后，一、三、四、五大队任务是分散到附近各县扩军，组建部队。二大队在山云镇担任总队部警卫，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军政训练时间各半。军事训练有队训教练、军事技术（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和战术教练。战士们迫切要求掌握杀敌本领，青年知识分子接受能力又强，军事技术、战术学习进步很快，成绩很好，全大队实弹射击优秀。为实战要求加强体育锻炼，大队经常组织爬山比赛，山云镇南山有一个老爷顶，我一口气跑上老爷顶。我们二大队近三个月的军政训练，军事政治素质迅速提高，武器装备也比较好，四、五中队战士一人一支步枪，四颗手榴弹，每个中队有六挺轻机枪。为了破坏和迟滞日寇渡黄河西取潼关、西安的战略计划，我二大队奉命出击同蒲铁路线，配合决死二纵队作战。六月二十日，我二大队进到灵石以西王禹村，以此为基地，对秦王岭至南关一线日军据点和交通线实施连续破击战，大小战斗二十余次，打击了敌人，又锻炼了我们部队。政卫队《战旗报》特约记者都作了专题报道。

到了三九年夏季，山西政治保卫队由一百余人的一个小政卫队，扩大发展为四千余人的抗日生力军。山西政治保卫队是山西人民的子弟兵，更确切的说是在临汾得到了发展。

离开临汾后，山西政治保卫队转战晋中等地，出击歼灭日军，同阎锡山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推行的“投降、分裂、倒退”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在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中，山西政治保卫队大部分干部战士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对日作战，一面抗击阎顽军的疯狂进攻，并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帮助下，摆脱了敌人，进入太岳民主根据地。一九四零年初，山西政治保卫队在沁源县集结，太岳军区决定组建四十二团，以晋西过来的部队编为第一营，王天枢连为团特务连。团长杨育才，付团长刘丰、政治委员马佩勋，参谋长高志和、政治处主任南敬之。一月之后，杨育才去北方局党校学习，马佩勋调二一二旅任政委。四十二团团长为刘丰、政委为南敬之。

至此原政卫队（二〇九旅），这支武装编入我军正式序列，干部战士们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浴血奋战，作出了无私奉献；有些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烈士们的英名功勋永垂青史。我们每一个幸存者将永远怀念他们！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于郑州

（作者曾在著名的官雀战投中任太岳纵队十一旅三十一团政治委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军副政委、河南省副省长等职，现离休）

（责任编辑 梁正岗）